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於二零一四年法律年度開啓典禮演辭 (中文譯本)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律師會會長、各位司法人員、法律界同業、來自海外的嘉賓和法律專業團體的領袖、女士們、先生們:

1. 十分高興，今天與各位新知舊雨在這法律年度開啓典禮，聚首一堂。這典禮的常客，聽到我首先要說的是法律援助這每年都要談的問題的時候，也許會認為我的發言像一張跳了線的唱片，不斷重覆。
2. 在去年六月，民政事務局根據 2010 年至 2012 年之通漲，建議上調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9.3%。在去年九月，法律援助服務局(“服務局”)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特首”)建議說「無迫切的需要去設立一個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
3. 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上述兩項事情都不能接受:
 - (1)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低得不能再低，要處理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不能只依賴兩年一度的按照一個大有問題的基準費用而作調整。再者，若將(i)政府給予處理法援刑事案件的大律師委聘和延聘費用，和(ii)政府支付其他法律服務的費用對比，實在有天壤之別；若再將(i) 1975 年

一個處理刑事案的大律師的平均委聘費用，與(ii)現今處理刑事案的大律師所收的低微委聘費用相比，所得的結果就算不令香港蒙羞，也會令政府尷尬。

- (2) 法律援助服務局給予特首的建議，大律師公會認為服務局所持的理據薄弱。這跟它們的前主席於 1996 年曾經明確表示的建議相比，實屬「開倒車」。

來年，香港大律師公會將繼續努力爭取全面改革刑事案件之法律援助制度，和設立一個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

4. 大律師專業面臨來自香港本土和海外的競爭。競爭並非壞事，因為有競爭才能將人的才華發揮出來，香港大律師專業早已準備就緒迎接挑戰。我想在此重覆我在 2013 年 12 月舉行的大律師獎學金頒獎典禮上說過的一些話，就是當我見到一些學術上成績斐然的優秀年青人，不在乎即時的高薪厚職，而選擇加入毫無經濟保障的大律師專業，感到十分欣慰。大律師公會將繼續培育一個強大、自主的本地大律師專業。這包括在法庭處理海外大律師就個別案件出庭而提出的認許申請時，就有關的公眾利益向法庭陳辭。我們必須在培育本地大律師人才，和在真正有需要的案件時才准許委聘海外大律師之間取得平衡，以令強大自主的本地大律師專業得以壯碩成長。

5. 去年,「法治」一詞在香港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和討論,我想借此場合提醒公眾,「法治」這概念的真正意義。
6. 「法治」的一個重要原素是有法律條文(包括刑事法及民事法)規範居民、機構和訪客的活動。而且必須有一些有效的機制,去執行這些法律條文。
7. 但假若社會大眾誤以為這就是「法治」的全部,那就大錯特錯。
8. 一個真正尊重「法治」的社會,應該同時確保另外三大原則: (i) 有機制監察政府行使酌情權的合法性; (ii) 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條文要對基本權利有所保障; (iii) 獨立不受政府或商業利益(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明示還是暗示)控制或影響的司法機關和同樣獨立的法律專業。
9. 有些人會爭辯說在某些國家或體制內,「法治」的定義不包含以上三點。這爭論可謂沒完沒了,但最關鍵的是,香港的成功和繁榮一直有賴在一個有著上述的特點的制度。
10. 假若一個社會只是徒具一套法律和對一般百姓執行這套法律的機制,法律便會淪為當權者統治人民的工具,「依法辦事」便會成為萬事的擋箭牌。「法治」這概念會變質,成為「以法管治」。好像中國古代傳說在淮河以南的橘子,本來很甜美,但拿到淮河以北種植便變了味道苦澀的枳,不宜食用。

11. 我希望補充一下，「法治」是否本固枝榮，歸根究底其實有賴社會整體的道德意識和公民素質，或曰「集體良知」。假若社會整體缺乏這些社會意識，縱然有最草擬完善的法律、最好裝備的警隊和最高科技的法庭都是徒然的。
12. 大約三千年前春秋時代，齊國的宰相管仲曾經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我剛才說的社會道德意識，其實即是中國古代智者所指的「禮義」和「榮辱」。如果一個國家或社會這些觀念垮了，禮崩樂壞，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重建。
13. 說到「衣食足」，我最近看見以下一則意見，大意是說：香港人常說自己文明，有民主自由，就是因為在經濟上不再處於優越地位，因此就突出其他優越的地方來自我陶醉，自我平衡。
14. 就以上我有兩點要回應。
15. 首先，這觀點的潛台詞似乎是凡事的出發點都是比較物質上的富饒。但是，即使今天社會上充斥着「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等各種各樣口號，而法律服務很多時變得好像只不過是商業交易的附從，但仍有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諺語有云：

「不是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能以數字衡量，亦不是所有能計算的東西都有價值。」

16. 但更重要的，特別是今天的場合下，香港為何常常提醒自己法治的重要性，絕對不是要平衡什麼，更不是自我陶醉。
17. 此時此刻，我希望與你們分享在 1980 年 1 月 7 日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羅弼時爵士(當時的首席按察司，不幸於去年辭世)的部份講辭。

我們的人口有很高的比例是來自其他地方，他們來到這裡，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當中未必有很多人是因為欣賞我們的法律和司法原則而來。但其實我們的原則是值得他們欣賞的。

正是這些原則，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如果法院腐敗，被偏見所左右，或受到外界人士或機構的不當影響，個人權利受保護的希望就變得渺茫。……

假如「民主」的意思是指在政治制度下主要的官員交替定期由選舉決定，那麼香港便不是一個一般人所稱為「民主」的社會。然而，香港卻是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

我所指的是在社會上人人受法律保障；還有，除非法律授權，否則個人的財產或人身自由都不會被剝奪；除了在一些為了維持秩序和保障個人的聲譽而訂下的限制之外，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他的想法，及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會受政府干預。

只有不偏不倚、獨立自主和無懼無畏的司法機構才能保障一個自由的社會。自 1841 年起，香港一直享有這珍貴的優勢。雖然我們的法官和裁判官不是時時刻刻都睿智、有耐性、聰明或博學，可是，在他們當中，沒有幾位會欠缺保障個人自由的必備素質。

18. 以上字字鏗鏘，擲地有聲，一字一句至今仍然適用。香港一直享有法治的優勢，無論是在 1841 年、1980 年、1997 年抑或 2013 年。我想羅弼時爵士在 1980 年（三十四年前，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說這番話的時候，原因應該不是所謂「香港經濟不再處於優勢，自我陶醉，自我平衡吧」？

19. 我們時刻強調法治的重要，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警惕」。正如御用大律師 Sir Sydney Kentridge 在他的著作《自由的國度》（“Free Country”）中說：

「我們不應該假定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在任何地方都是牢不可破的。首先，這取決於法官的誠信，這點在本地我們毫不懷疑。第二，是政府是否遵守自身權力的制約，但這同樣取決於我們作為公民給予法官在行使其重要憲法功能時的支持……」

20. 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在履行其憲法職能時，必然會作出一些不受政府或社會上某些界別歡迎的決定。英國著名法學家 Lord Bingham 大法官在以

「政府和法官」為題的演說中說到：「在世界上有些國家，法院的所有判決都對政府有利，但這些地方不會是人們會願意去居住的樂土」。因此，我們有責任確保公眾充分了解「法治」的意義，這樣一來，即使公眾不喜歡某些法院的裁決，都會尊重司法獨立這不可動搖的基石和學會珍惜一個真正獨立的大律師專業。

21. 近年來，媒體和法律界人士常常談到高級法官任命或退休安排，猜測司法機構在沒有某些法官的情況下，是否可以維持傳統，繼續保護人權和法治，又或者某些法官是否比其他的法官更加尊重人權。這種論調說得好像香港法治只靠一兩個「英雄」。這種想法恕我說坦白一點，其實是一種以「法治」為名的「人治」。當我們談論「法治」，我們所指的是制度和精神本身，而不是單指任何個人。
22. 我們也必須再次銘記御用大律師 Sir Sydney Kentridge (對不起 Sir Sydney, 今天過勞了) 在 *Free Country* 一書中所說的話：

「尊重權利的司法文化並不意味著個人必須經常戰勝國家，或者個人的權利必須擴展到極限。」

23. 我們還應該牢記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於 2010 年 1 月法律年度開

啓典禮中說過的話:-

「若行政或立法機關勝訴，這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偏袒。

同樣，若判行政或立法機關敗訴，也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對抗。

無論判決如何，法庭都只是履行憲法職能，公平公正地審理案件。」

24. 第二句話當然是完全正確，但我們卻不能藉機忘記第一句和第三句，它們必須整體來看，我們絕對不能有雙重標準，輸打贏要。

25. 如果今天我不提及政制發展，大家可能不會容許我離開這裡。大律師公會將會在諮詢過程中的適當時刻提供意見，但我想在這個階段強調兩點：

(1) 基本法設定了選舉方案的外框和基本要求，任何一個方案，若根據法律分析後不屬於基本法訂下的範圍內，即不獲憲法授權。糾纏斟酌於精警的片言或標籤口號實在於事無補。一句標籤或口號可以覆蓋一大堆不同的含義，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些含義可能連支持者之間都未能達成一致共識。支持某方案的人士，無論有多少民意支持，也有責任詳細說明方案如何符合基本法或是基本法認可的；當然，以法律理由反對的人，無論多麼位高權重，也有責任解釋分析法理基礎，不能一句話便

「說了算」。

(2) 話雖說回來，在基本法授權的範圍下仍有許多空間可以提出不同法律允許的方案。一個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仍可能基於政治理由令當權者有所保留。如果是的話，政府就應堂堂正正把這些政治理由拿出來讓公眾公開討論和辯論。我們不想看見實屬政治性的反對理由被定性為所謂法律理由，令公眾不能就一些符合基本法的提議進行政治討論。香港人一向尊重法治，但不希望這概念被(也許不知不覺地)利用來處理一些根本不屬法律範疇的東西。

26. 我們活在有趣的時代，不論在法治或憲制發展上，我們都面對相互矛盾的訊息。當我一年前接任公會主席時，我被記者包圍，他們請求我評論「香港的法治天空已陰霾密佈」這論調。然而，在我的任期接近尾聲時，一名行將退休的終審法院法官公開、明確地向我們保證，在司法任命方面，過去從未受到任何干擾。展望未來，香港面臨憲政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有些人樂觀，有些人悲觀和沮喪，有些人不確定，也許有些人一點也不在乎。

27. 我們該怎麼辦？讓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封於大約三十年前由一位當年 18 歲的年輕人簽署日期為 1984 年 1 月 4 日的信。我們很多人還記得當時香港社會正處於不穩，超市剛出現長長的人龍搶購廁紙，港元和美元也剛掛鈎。以下是這位年青人寫給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入學導師的信：

「敬啓者：

我獲得劍橋大學取錄由1984年10月開始修讀法律。然而，如你所知，1997年將至，香港的法律制度前景仍不明朗，目前尚未有關於香港未來法律制度的任何正式聲明。萬一香港未來的法律跟英國法律有很大的分歧，我的法律知識將可能用不著。因此經考慮後，我決定申請從法律系轉到自然科學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8. 後來經過一輪通訊和反思，年輕人終於打消了轉科的念頭。若果年輕人轉了科，三十年後的他今天便不會站在這裏跟大家說話。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堅持信念」。
29. 再過兩星期就是農曆新年。我代表香港大律師公會祝大家身體健康，馬年興旺，龍馬精神！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石永泰資深大律師